



任继愈

谈

汉唐佛教思想

上卷

任继愈◎著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任继愈

谈

汉唐佛教思想

上卷

任继愈◎著

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任继愈谈汉唐佛教思想 / 任继愈著. —北京: 石油工业出版社, 2018.3

ISBN 978-7-5183-2348-7

I. ①任… II. ①任… III. ①佛教—研究—中国—汉代 ②佛教—研究—中国—唐代 IV. ①B9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5287 号

任继愈谈汉唐佛教思想

任继愈 著

出版发行: 石油工业出版社

(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楼 100011)

网 址: www.petropub.com

编辑部: (010) 64523783

图书营销中心: (010) 64523633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晨旭印刷厂

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880×1230 毫米 开本: 1/32 印张: 17.25

字数: 370 千字

定价: 68.00 元 (全二册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我社图书营销中心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目 录

佛教与中国思想文化 / 1

辑一 汉唐佛教思想·上卷

中国佛教的特点 / 002

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/ 022

南朝晋宋间佛教“般若”“涅槃”学说的政治作用 / 047

隋唐时期的佛教文化 / 074

唐代三教中的佛教 / 087

武则天与宗教 / 096

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 / 119

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 / 166

华严宗哲学思想略论 / 220

禅宗哲学思想略论 / 267

辑二 汉唐佛教思想·下卷

敦煌《坛经》写本跋 / 318

神秀北宗禅法 / 329

从佛教到儒教——唐宋思潮的变迁 / 351

从佛教经典的翻译看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 / 363

编辑《中华大藏经》(汉文部分)的意义 / 393

关于《物不迁论》——一篇形而上学的佛学论文 / 405

关于《不真空论》 / 420

关于《般若无知论》 / 434

关于《神灭论》 / 457

关于《杜阳杂编》 / 475

汉—唐佛教简明年表 / 480

后 记 / 505

再版附言 / 507

三版附记 / 508

四版附记 / 511

附录 《汉唐佛教思想论集》日译本序 / 514

辑一

汉唐佛教思想·上卷

中国佛教的 特点

任继愈谈汉唐佛教思想

佛教起源于古天竺，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，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支柱之一。现在分四部分来阐明中国佛教^[1]的特点。

[1] 过去讲中国佛教仅限于汉地佛教，我们所指的“中国佛教”，包括中原地区汉地佛教以及藏传佛教和云南地区的傣族小乘佛教。

一 中国佛教随着历史前进而前进

佛教传入中国后，与汉代神仙方术相结合，成为汉代道术的一种。桓帝在宫中“立黄老浮屠之祠”，与当时流行的祠祀同样看待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佛教与玄学配合，使当时士大夫为之倾倒。以后，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不断前进，佛教也密切配合不同社会时代的需要，不断充实，改变着它的形式和内容，发展了自己，充实了中国文化、哲学的内容。如果说，中国佛教的特点是什么，它第一个特点是不停顿^[1]。

[1] 这一点，在我们的《中国佛教史》第1、第2卷中已有比较详细的论述，这里不再重复。

二 中国佛教的协调性

中华民族是在秦汉开始即形成了多民族的封建专制的大一统的国家。几千年来，中国人认为大一统的形势是正常的，分裂割据是不正常的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。各民族之间长期合作，频繁交往，给民族文化的融合创造了条件。秦汉以前且不说，秦汉以后，中华民族的大融合，约有四次^[1]，这四次民族大融合的意义不限于血统上，主要是在文化上。多次融合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——文化共同体。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，都以儒家三纲五常为治国治家的唯一合法思想，纲常名教已被各族所接受。

除了多民族的文化融合以外，还有广大地区性的文化融合。中国地域辽阔，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是中国文化的摇篮，这两大地区的文化都有自己的传统，长期形成各自的特色。在统一的中央政权领导下，南北各地有了经济的、文化的、人才的交流，互相吸收，互相影响，不断地促进着中华民族文化的

[1] 第一次晋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，南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；第二次是唐末五代，北方各民族的融合；第三次是宋、西夏、辽、金、元的大融合；第四次是清朝的民族融合。

发展。在总的趋势下，佛教文化、佛教思想也受到这种协调发展的影响，并有所反映。

印度佛教的大小乘，不同的学派，都先后传入后，出现内部矛盾。译者的偏好不同，教派的宗旨各异，中国佛教则以判教的方法去调和佛教内部教义的分歧，认为各种经典都是佛说，只是由于时间、地点、听众理解水平不齐，才有针对性地宣讲不同的道理。佛教宗派本来门户之见很深，古代印度教派的争论有时以生命为注（失败者，斩首相谢），中国的佛教派别间有争辩，但不像印度那样激烈，有时一个人同时信奉两个宗派。^[1]

中国佛教与它同时并存的教化思想流派及不同宗教信仰，也随时采取容纳、吸收、协调的态度。这种协调不是表面的敷衍，而是认真的吸收。比如汉地佛教对社会上影响最大的儒家和道教，有争辩，但更多的情况下，采取吸收的手段。儒家的纲常名教是儒家的核心思想，敬君主、敬祖先是儒家悠久传统，佛教对此予以合理的吸收。从牟子《理惑论》开始，千余年来，不断有攻击佛教不忠不孝的说法，中国佛教徒的辩论中总是一再强调，儒以治身，佛以治心，或者说佛与周（公）孔（子）之道殊途同归。《中庸》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，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”。

[1] 宗密信华严，同时又是禅宗的大师，此例不鲜。社会上甚至佛教、道教之间的界限更不分明。

藏传佛教也是尽量与西藏当地宗教取得协调，吸收了西藏地区的民族宗教（苯教），形成了独特形式的藏传佛教体系，它既不同于印度佛教，也不同于西藏当地的原始宗教，建成了俗称“喇嘛教”的藏佛教。它流行的地区已不限于西藏一域。^[1]

[1] 它还传播到甘肃、青海、云南、内蒙古，以及尼泊尔、锡金、不丹、原苏联远东一带地区。近二十年来，还传播到欧、美、日本各国。

三 中国佛教的创造性

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间，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，第一阶段为译述介绍阶段，这是从汉代到南北朝，历时约五百年。这一时期佛教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外国译经僧人，他们是主译者，也是所译经典教派的宣传者。

中华民族有优良文化传统，深厚文化素养，对外来文化经过消化、吸收，继而创造，即使在介绍阶段也有创造。佛教般若学在西晋时期广泛流行，“六家七宗”应时而起。这些流派都是对般若“空”义提出的不同的理解和阐释。僧肇曾指示这些流派对般若性空义的理解都有片面性，这种指摘是有根据的。但是，我们结合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来考查“六家七宗”的出现，是中国佛教学者企图摆脱依傍，提出自己见解的首次尝试。

隋唐时期，中国佛教进入第二阶段，我们称为创造发展阶段，历时约三百年。第一阶段的佛教代表人物几乎都是外国僧人。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几乎全是中国人。如果说隋唐以前介绍佛典原著要借重外国僧人，隋唐以后，介绍翻译工作，中国僧人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。这一阶段翻译外国典籍的比重减少，中国人自己著作的比重增加。这一时期佛教传播的重心

已转移到中国。印度大乘小乘各流派在中国均有传承，但中国佛教更着重离开佛教词句发挥佛教的微言大义。有些发挥，可以在印度佛教某一流派的著作中找到依据，赋予新义；也有的完全阐发自己的体系。隋唐以后的几个大的佛教宗派，都在印度树立自己的开山远祖，有的自称远绍龙树，有的自称秉承迦叶，有的宗派撰出历历可数的谱系，其实都没有根据。南北朝中期以后，到隋唐，不断出现所谓“伪经”。这些“伪经”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思潮，有很重要的思想史料价值。

最能代表中国佛教的创造性的，是中国佛教中许多宗派开创人的著作。如智顗、惠能、法藏、澄观，以及后来各派涌现的中兴祖师，如宗密、湛然、知礼等人的著作，都以注释或讲解佛典的方式^[1]建立各自的佛教理论体系。这些著述都以述为作，直抒胸臆。这些著作（经、论、疏、抄）少的几卷，多的几十卷、几百卷，它们丰富了中国佛教内容，开创了佛教理论研究的新局面。这些佛教论著，从出世的立场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，也反映了时代思潮的一个侧面。从世俗立场，从人类认识史、文化史的角度来看，中国佛教史等于中国文化史、中国思想史。

[1] 对佛经阐释的，如《华严》《法华》《涅槃》《维摩》等经，《大智度》《摄大乘》《起信》《唯识》等论。

四 中国佛教的“三教合一”

(一)

隋唐初期，中国思想界即有了“三教”的名称。三教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教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教与外来的佛教。孔子和老子都是先秦时期公元前5世纪的哲学家、思想家、学者，不是宗教的领袖。孔子、老子被神化，被说成宗教的创始人，是后来人们塑造出来的。

隋唐时期，中国佛教、道教都得到中央封建政府的提倡，与儒教并列，形成三教鼎立的局面。儒教主张维护中国封建君权的“三纲”说，即君臣、父子、夫妇的绝对服从关系永恒不变。三教从不同的方面为同一个封建皇权服务。它们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，也有过矛盾斗争。在矛盾中，佛教、道教都分别遭到政治上的打击。而儒教也认识到，佛教和道教的一些宗教思想可以辅助儒教世俗说教的不足。在唐朝后期，三教的重要思想家都主张三教会同，主张在理论上互相包容，有时候只是在政治上互相排斥。唐宋以后，直到鸦片战争（1840），这种儒、佛、道三教融合的总格局没有改变。这种思潮，对于中国

后期封建社会起了稳定作用，从而延缓了中国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速度。三教合一思潮，构成了近千年来中国宗教史、中国思想史的总画面。

(二)

佛教的三教合一思潮。隋朝李士谦论三教，说，“佛日也，道月也，儒五星也。”（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十）隋唐以后，中国出现了大批“伪经”，所谓“伪”，是指它不是来自西方，是中国人自己编造的。伪经名目繁多，各有特点，有所偏重，但它们都强调中国封建伦理，忠君、孝父母等儒教思想。唐代僧人宗密《原人论》中说：“孔、老、释迦皆是至圣，随时应物，设教殊途。内外相资，共利群庶。”五代时僧延寿，主张三教融合，“儒道仙家，皆是菩萨，示助扬化，同赞佛乘”（《万善同归集》卷六）。北宋元祐年间，四川大足县石篆山石窟造像，即将儒、佛、道镌刻于一处。北宋的三教合一，反映了代表中央政权的儒教为中心的势力的增强，佛、道两教均主动向儒教接近的趋势。宋代的孤山智圆自称“宗儒述孟轲，好道注《阴符》，虚堂踞高台，往往谈浮图”（《闲居编》卷四十八《潜夫咏》）。他主张“修身以儒，治心以释”（《中庸子传》上），以佛教徒的身份，而自号“中庸子”，还认为没有儒教的支持，国家不得安宁，佛教也不能推行。他为了宣扬“中庸之道”，不惜违反佛教教义，他说：“释之言中庸者，龙树所谓中道义

也。”（《中庸子传》）龙树“中道”为不执着有无、真假，儒家的“中庸”指的是处世对人要无过无不及，两者本不相干。

宋赞宁也说：“三教循环，终而复始。一人在上，高而不危。有一人故，奉三教之兴；有三教故，助一人之理。”

僧人契嵩著《辅教编》中有《孝论》凡十二章，具论忠孝，“拟儒《孝经》，发明佛意”。还说，“夫孝，诸教皆尊之，而佛教殊尊也”（《孝论·叙》，见《铎津文集》卷三）。佛教本来号召出家，脱离家庭的父子伦理关系的，而佛教的代表人物却高唱佛教比儒教、道教更看重孝道。

明朝株宏继承了这个方向，也主张三教“同归一理”“三教一家”。僧真可《题三教图》，又有《释毗舍浮佛偈》，认为“仁”“义”“礼”“智”“信”都是值得敬礼的佛（如来）。德清有《大学纲目决疑》以说明儒教与佛的一致性；又作《道德经解发题》《观老庄影响论》以说明道教与佛教的一致性，认为“孔老即佛之化身”。智旭（1599—1635）以儒教的十六字诀融通佛教，并著有《周易禅解》《四书蕅益解》，主张孝道，“儒以孝为百行之本，佛以孝为至道之宗”（《题至孝回春传》）。“以真释心行，作真儒事业”（《广孝序》）。“非真释不足以治世，是以一切三宝常能拥护世间，而真儒亦足以出世。”（《玄素开士结茅修止观助缘疏》）